

# 疫情中幼儿“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

## ——对中国大陆 5 岁幼儿调查的数据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以猝不及防的方式袭击全球，在这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下，已有的亲子关系和育儿方式是否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幼儿的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会呈现何种特点？为了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CRN 日本儿童研究所组织了亚洲各国进行跨文化研究，中国大陆有幸成为研究成员。按照研究要求，我们在山西太原市沃德兰教育集团组织了 264 名 5-6 岁幼儿的母亲进行了问卷调查，以“问卷星”的方式，进行了线上调查。回收和有效率均达到 100%。本报告就是本次调查的分析结果。

### 1. 样本构成的分析

这部分以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介绍接受本次调查研究的中国大陆 5 岁幼儿及其家庭的人口学变量构成及其特征分析。

#### 1.1 样本构成

样本构成将分幼儿及其家庭背景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 1.1.1 被试幼儿的构成

表 1-1 中国大陆被试幼儿的性别和年龄

		n	%
性别	1 男	138	52.3
	2 女	126	47.7
年龄 (5岁)	1 5岁0-2个月	63	23.9
	2 5岁3-5个月	84	31.8
	3 5岁6-8个月	76	28.8
	4 5岁9-11个月	41	15.5

### 1.1.2 被试幼儿的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的人口学变量描述性统计将从居住情况（是否核心家庭）、父母就业情况、学历、收入等方面进行。

表 1-2 被试幼儿家庭的居住情况

		n	%
共同居住的成员	1 受试儿童	218	82.6
	2 受试儿童的兄弟姐妹	96	36.4
	3 配偶/伴侣	232	87.9
	4 我的父亲	29	11.0
	5 我的母亲	53	20.1
	6 配偶/伴侣的父亲	37	14.0
	7 配偶/伴侣的母亲	49	18.6
	8 亲戚	5	1.9
	9 保姆	10	3.8
	10 其他	5	1.9

表 1-3 被试幼儿母亲及其配偶的就业情况

	母亲		父亲	
	n	%	n	%
1 全职人员（全职员工/正式员工；包括居家办公）	166	62.9	177	67.0
2 兼职人员	8	3.0	4	1.5
3 合同工	18	6.8	13	4.9
4 家里自己做	14	5.3	5	1.9
5 雇主	1	0.4	0	0.0
6 自己开公司	12	4.5	45	17.0
7 农林渔业	0	0.0	0	0.0
8 家庭主妇	32	12.1	0	0.0
9 学生	0	0.0	0	0.0
10 失业	2	0.8	1	0.4
11 其他	11	4.2	16	6.1

表 1-4 被试幼儿母亲及其配偶的学历

	母亲		父亲	
	n	%	n	%
1 小学	0	0.0	0	0.0
2 初中	4	1.5	6	2.3
3 高中	12	4.5	13	4.9
4 高职	3	1.1	5	1.9
5 大专	55	20.8	54	20.5
6 本科	145	54.9	139	52.7
7 硕士	42	15.9	41	15.5
8 博士	2	0.8	2	0.8
9 其他	1	0.4	1	0.4

表 1-5 被试幼儿的家庭收入

	n	%
1 无收入(0元)	0	0.0
2 低于7.5万(含)元	17	6.4
3 高于7.5万但低于15万(含)元	83	31.4
4 高于15万但低于37.5万(含)元	100	37.9
5 高于37.5万但低于60万(含)元	16	6.1
6 高于60万但低于90万(含)元	5	1.9
7 高于90万元	6	2.3
8 不知道/不想回答	37	14.0

表 1-6 新冠中被试幼儿的家庭收入变化

	n	%
1 无收入	2	0.8
2 减少	107	40.5
3 不变	111	42.0
4 增加	17	6.4
5 不知道/不想回答	27	10.2

## 1.2 样本特点

### 1.2.1 被试幼儿样本特点

男女幼儿比例均衡、年龄涵盖 5 岁全年龄段。从表 1-1 可见，中国大陆 5 岁幼儿被试男孩略多于女孩，年龄分别最多集中在 5 岁 3 个月至 5 岁 8 个月，男女幼儿的比例基本均衡，年龄分别比较均匀。

### 1.2.2 被试幼儿家庭特点

大都为核心家庭、幼儿与父母同住。从表 1-2 中可知，被试幼儿家庭大都是核心家庭，幼儿与自己父母居住在一起，也有极小部分是大家庭，与祖辈居住在一起。

一半以上为全职、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年收入大都处于平均水平。表 1-3 显示了被试幼儿母亲和父亲全职多占 60% 以上，父亲有 17% 是自营业者（自己开公司），而 12% 的母亲则为家庭主妇。表 1-4 说明被试父母的学历中大专和本科都在 70% 左右，硕士学历分别占 15%-16%。中国平均年收入的中间值处于 15 万元至 37.5 万元，表 1-5 说明了被试幼儿家庭的年收入处于这个中间值占比 37.9%，年收入略低于这个中间值的也占 31.4%。新冠对家庭收入来说，减少的比例还是高达 40.5%，说明疫情对家庭收入还是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接受调查的 5 岁幼儿家庭具备了中国大陆城市中，父母有较高学历、年收入处于中产阶级水平的家庭特点。

## 2. 现状及影响因素

本次跨文化研究主要聚焦疫情背景下幼儿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和幼儿的“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因此，在这部分的报告也将围绕这两个主要变量进行数据分析。

### 2.1 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的现状

本次研究中，使用了 Child and Youth Resilience Measure（PMK-CYRM-R）

量表，从母亲的感知的角度，采集了 5 岁幼儿的“心理弹性”的现状数据。虽然母亲的感知会带有主观色彩，但在此分析以母亲的感知是基于事实为前提来进行。

### 2.1.1 单纯统计

根据 CYRM-R 因子结构，Q6 分为两个下位概念：幼儿个体和在亲子关系中体验的“心理弹性”表现。因此，表 2-1 也从总体和两个下位概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1 中国大陆 5 岁幼儿“心理弹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M	SD	N
Q6 总的心理弹性	4.423	.630	264
Q6 个人心理弹性	4.348	.642	264
Q6 照护者关系心理弹性	4.530	.666	264

根据 CYRM-R 计分规则，分值从 1-5 分，分值越高，说明幼儿的“心理弹性”表现越好。从表 2-1 中可见，中国大陆母亲所感知的自己 5 岁孩子，具有很强的心理弹性，特别是亲子关系中体现的“心理弹性”最强。

### 2.1.2 组间比较

限于篇幅，在此只选择各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的变量进行分析。

#### 2.1.2.1 年龄段的比较

图 2-1 显示了 5 岁组幼儿四个月龄段之间的心理弹性差异性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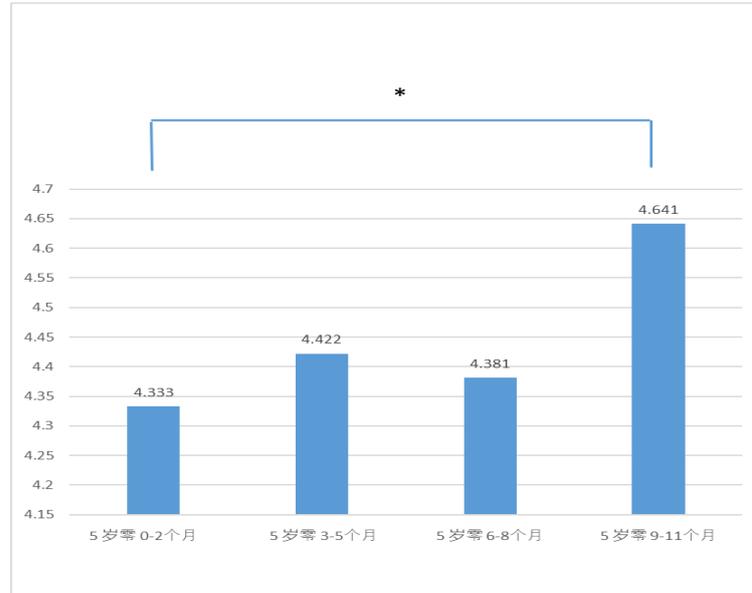


图 2-1 5岁组4个月龄段“心理弹性”得分比较

从图 2-1 可知，5岁 9-11 个月龄的幼儿“心理弹性”得分显著高于 5岁 0-2 个月龄的幼儿得分 ( $P<.05$ )，说明存在一定的年龄效应。

### 2.1.2.2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育儿参与度”变量的组间比较

图 2-2 显示了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育儿参与度”变量中得分不同的组间比较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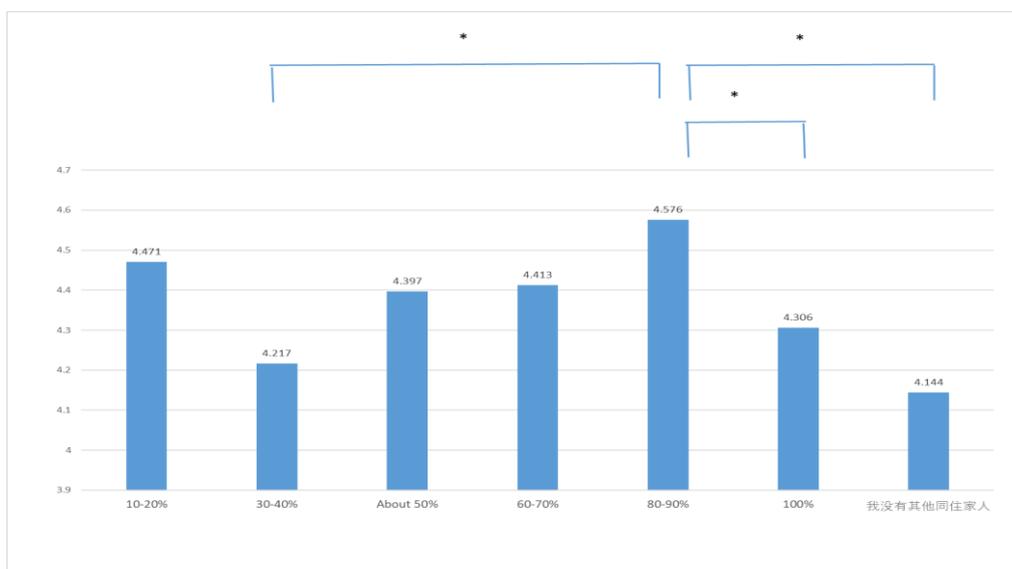


图 2-2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的育儿参与度”变量比较

通过解读图 2-2，我们可知 80-90%都由母亲带养的这组幼儿“心理弹性”得分最高，且在  $P<.05$  的水平上显著高于 30-40%由母亲带养组、100%由母亲带养组以及单亲母亲组的幼儿“心理弹性”得分。由此可见，比较辛劳的母亲可能会使幼儿体验到生活艰辛，但“没有其他同住家人”、缺少家庭成员支持育儿的母亲，可能无暇顾及幼儿的心理感受，因此其“心理弹性”得分较低。母亲的育儿参与度低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也较低，这昭示着母亲在有家人的支持下，能够有更多时间参与育儿，这将有利于幼儿“心理弹性”的形成。

### 2.1.2.3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及其配偶职业变量的组间比较

图 2-3 和图 2-4 分别显示了幼儿因其母亲及其配偶职业而产生的“心理弹性”得分的比较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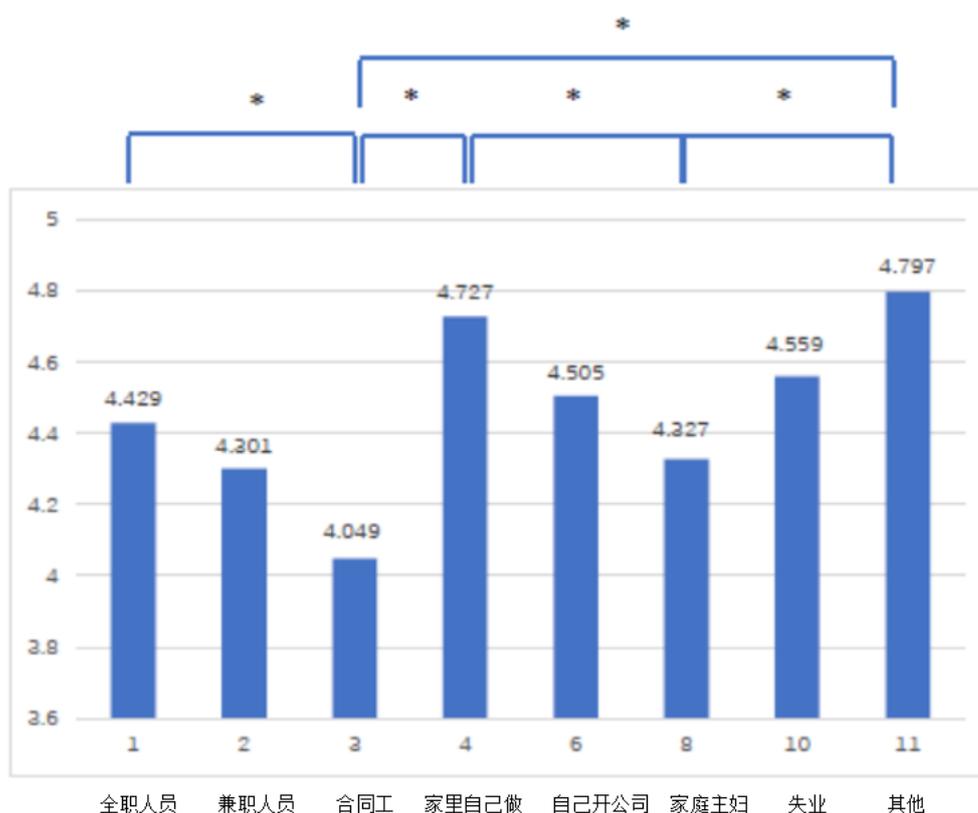


图 2-3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职业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3 中可见，母亲职业为“家里自己做”组以及“其他”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得分最高，母亲是全职人员的幼儿，其“心理弹性”得分较高。而母亲职业为“合同工”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得分最低。母亲职业是“兼职”的幼儿，其“心理弹性”得分较低。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存在  $P<.05$  的水平上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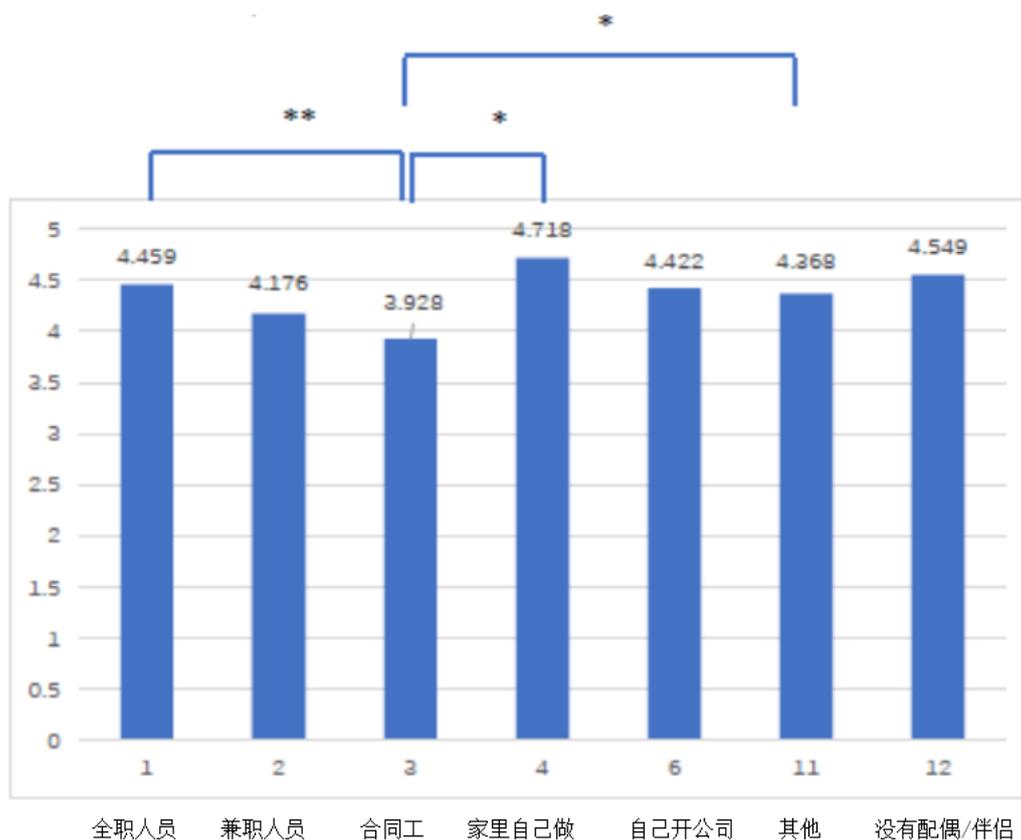


图 2-4 幼儿“心理弹性”在父亲职业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图 2-4 显示，虽然父亲的职业变量在幼儿“心理弹性”的组间比较不如母亲职业组间的差异明显，但依然看出，父亲的职业为“合同工”的幼儿“心理弹性”得分最低。

由此推测，由于职业的不安定，母亲及其配偶与幼儿的交流质量受影响，因而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相对较低。

#### 2.1.2.4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认可电子产品娱乐性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11 的四个选项，分别表明了母亲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认可度，从第一

组到第四组，分别显示了持反对态度及其变化和持肯定态度及其变化。图 2-5 呈现了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在母亲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认可度组间比较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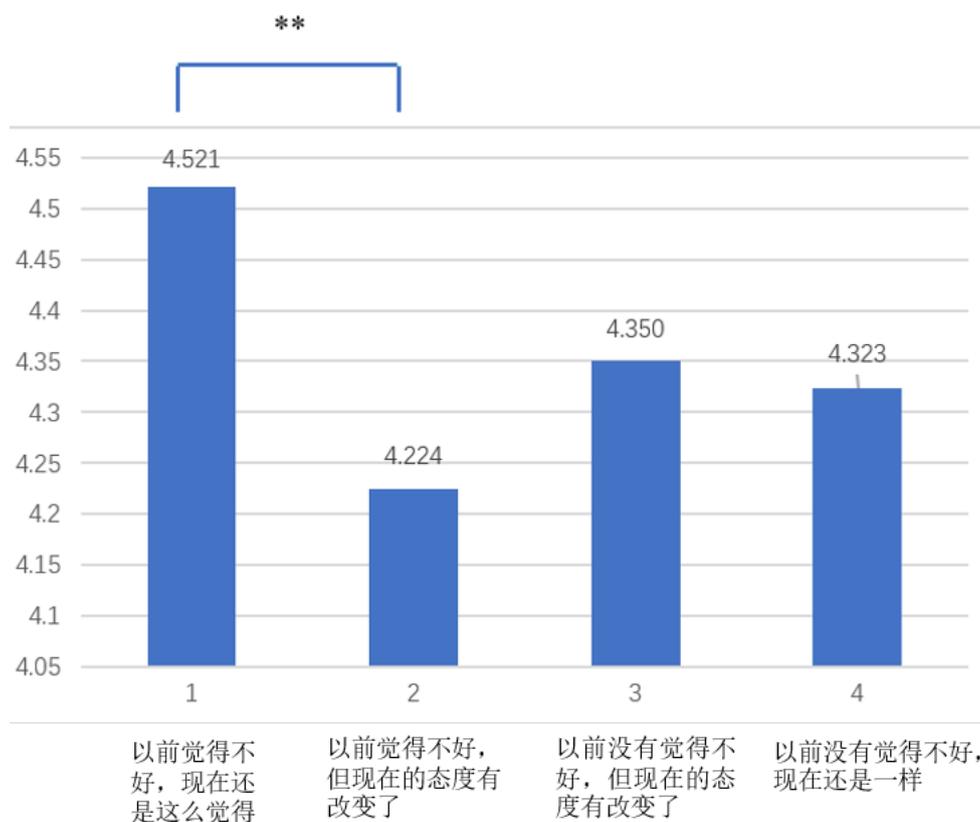


图 2-5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认可电子产品娱乐性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5 可见，母亲持坚决反对并一如既往反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作为娱乐工具态度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得分，在  $P < .01$  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母亲一开始持反对态度，但因为疫情而改变反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作为娱乐工具态度这组幼儿的得分。由图 2-5 推论，在对幼儿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娱乐的问题上，母亲持一贯的反对态度是有利于幼儿的“心理弹性”形成的。

#### 2.1.2.5 幼儿“心理弹性”在亲子关系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8 聚焦的是问卷填写者，即母亲对亲子关系的感知与育儿行为。分值范围从 10 分到 40 分，得分越低，说明其亲子关系越亲密，母亲越能够提供积极支持。在数据处理中，将 Q8 中得分为 10-20 分的组作为“积极亲子关系”高分组，

而 30-40 分组作为“积极亲子关系”低分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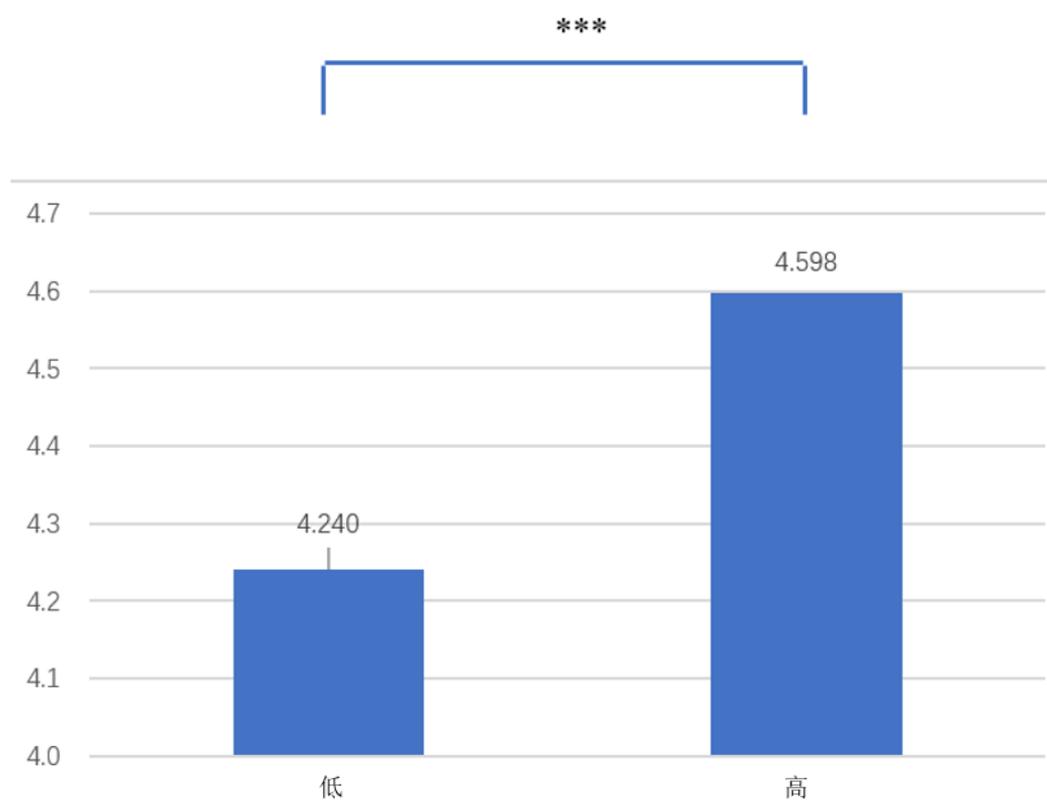


图 2-6 幼儿“心理弹性”在“亲子关系”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6 中可见，亲子关系对幼儿的“心理弹性”影响很大，母亲所感知和实际育儿行为对幼儿有更多积极支持、恩威并重的这组幼儿，其“心理弹性”的得分在  $P<.001$  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地高于母亲所感知和实际育儿行为对幼儿较少积极支持、不讲规矩的这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由此推论：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促进幼儿的“心理弹性”之形成。

#### 2.1.2.6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育儿观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17 聚焦的是填写问卷者，即母亲的育儿观。分值范围从 15 分到 60 分，得分越低说明母亲的育儿观越正向积极。在数据处理中，将 Q17 中得分为 15-30 分的组作为“积极育儿观”高分组，而 45-60 分组作为“积极育儿观”低分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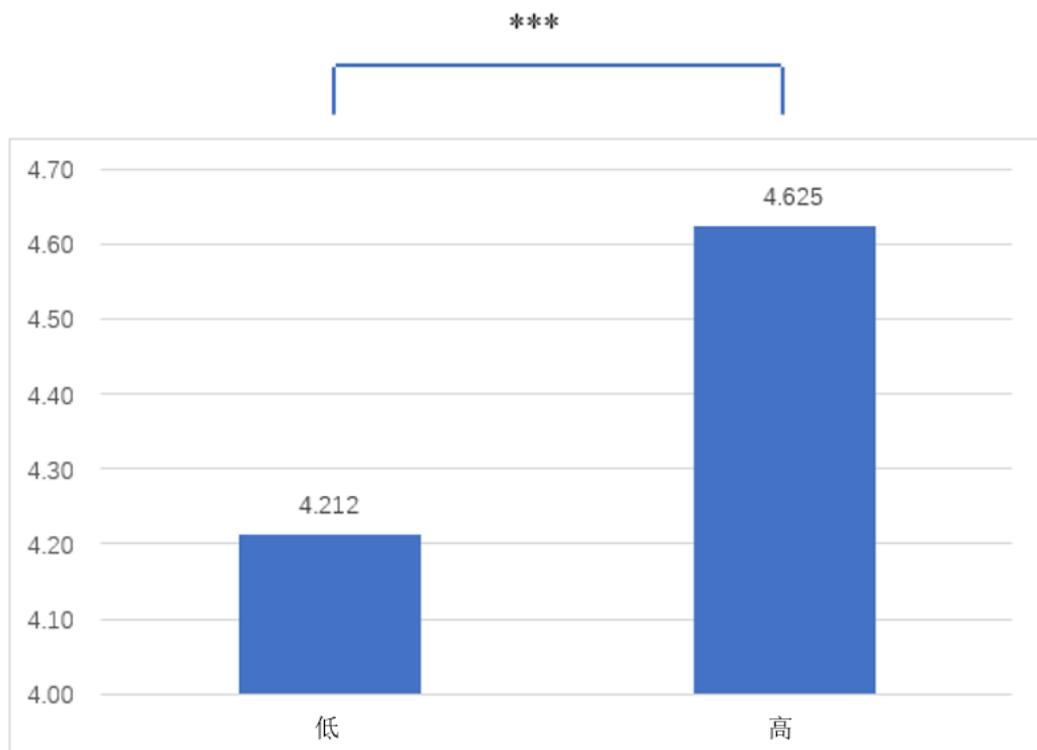


图 2-7 幼儿“心理弹性”在“积极育儿观”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7 中可见，母亲的育儿观对幼儿的“心理弹性”影响很大，母亲持“积极育儿观”高分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的得分在  $P<.001$  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地高于母亲所持育儿观不那么积极这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由此推论：母亲持有的积极育儿观，能促进幼儿的“心理弹性”之形成。

#### 2.1.2.7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满意度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20 聚焦的是填写问卷者，即母亲的育儿及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分值范围从 5 分到 25 分，得分越低说明母亲的满意度越高。在数据处理中，将 Q20 中得分为 5-10 分的组作为“育儿生活满意度”高组，而 20-25 分组作为“育儿生活满意度”低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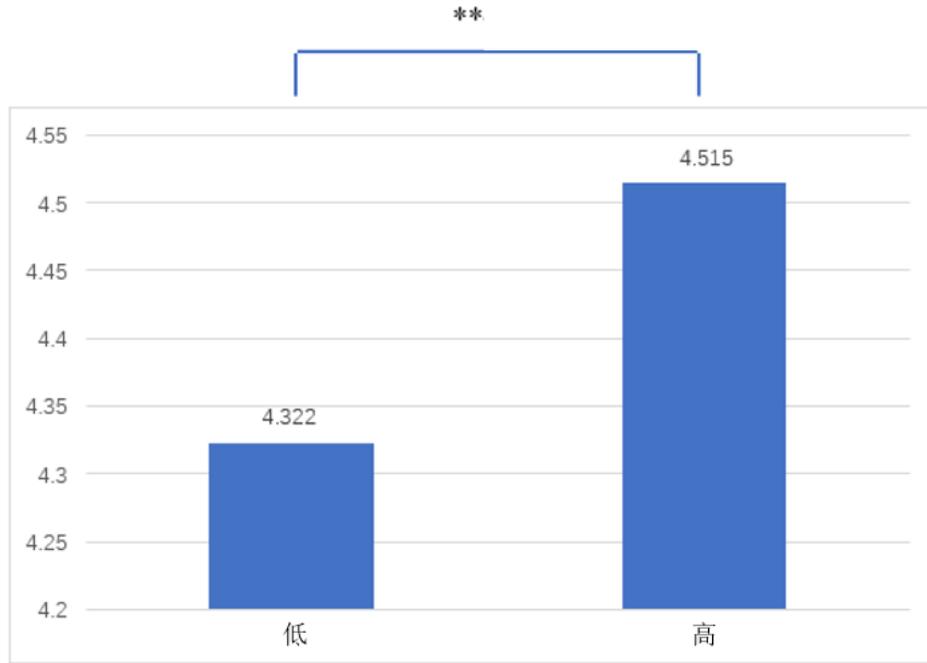


图 2-8 幼儿“心理弹性”在母亲“育儿生活满意度”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8 中可见，母亲的“育儿生活满意度”对幼儿的“心理弹性”影响较大，母亲“育儿生活满意度”高分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的得分在  $P<.01$  的水平上非常显著地高于母亲“育儿生活满意度”较低这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由此推论：母亲满意现有育儿状态及工作和生活状态，与幼儿的“心理弹性”之形成有关联。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幼儿的“心理弹性”总体得分较高。组间检验的结果，说明了以下的变量有较大或很大的影响。

从幼儿本身来看，月龄大的幼儿“心理弹性”得分显著高于小月龄幼儿，说明存在着发展因素。

从人口学变量来看，父母亲的职业对幼儿“心理弹性”也具有影响，父母亲职业稳定组幼儿的“心理弹性”得分在显著水平上高于父母亲职业为兼职、合同工等不太稳定组幼儿的得分。

从母亲的主观感受和育儿行为来看，亲密的亲子关系、积极的育儿观和自身的育儿满意度以及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控制组的幼儿，其“心理弹性”都在极显著水平上高出对比组幼儿的得分。

## 2.2 中国大陆幼儿“主观幸福感”现状

本次研究中,使用了 Questionnaire for Measur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KINDL,简称 QOL)量表,从母亲感知的角度,采集了 5 岁幼儿的“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数据。虽然母亲的感知会带有主观色彩而失之偏颇,但本分析是以母亲的感知是基于事实为前提来进行的。

### 2.2.1 单纯统计

根据 QOL 构造, Q7 分为 6 个下位概念: Q7S1-S4 为“身体健康幸福感”、Q7S5-S8 为“情绪幸福感”(在此译为精神幸福感)、Q7S9-S12 为“自尊幸福感”、Q7S13-S16 为“家庭幸福感”、Q7S17-S20 为“朋友幸福感”、Q7S21-S24 为“学校幸福感”。因此,表 2-2 也从总体和 6 个下位概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2 中国大陆 5 岁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M	SD	N
总幸福感QOL	4.193	0.491	264
幸福感身体健康维度	4.424	0.597	264
幸福感精神健康维度	4.152	0.632	264
幸福感自尊维度	4.169	0.745	264
幸福感家庭维度	4.011	0.561	264
幸福感朋友维度	4.205	0.588	264
幸福感学校维度	4.2	0.574	264

根据 QOL 计分规则,分值从 1-5 分,分值越高,说明幼儿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从表 2-2 中可见,中国大陆母亲所感知的自己 5 岁孩子,总体来看都具有较强的幸福感,特别是“身体幸福感”最强,“朋友幸福感”和“学校幸福感”次之,而最低的则是“家庭幸福感”。

### 2.2.2 组间比较

限于篇幅,在此只挑选各组间有显著差异的变量进行分析。

#### 2.2.2.1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育儿参与度”变量的组间比较

为更清晰地了解母亲的育儿参与度与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将调查问卷中的 Q18 的 8 组进行了重新编组，50%或以下自己带孩子的为 1 组、60-70%时间自己带孩子的为 2 组、80-90%时间自己带孩子的为 3 组、100%及单亲带孩子的为 4 组。图 2-9 显示了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育儿参与度”变量中得分不同的组间比较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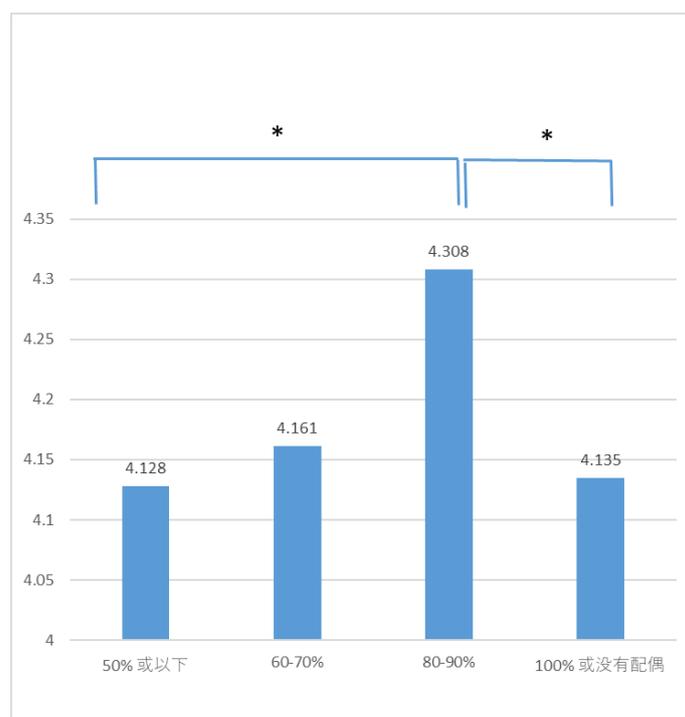


图 2-9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的家务/育儿参与度”变量比较

通过解读图 2-9，我们可知 80-90%都由母亲带养的这组幼儿“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且在  $P<.05$  的水平上显著高于低于 50%由母亲带养组、100%母亲带养组以及单亲母亲组的幼儿“主观幸福感”得分。

由此可见，比较辛劳育儿的母亲因为和孩子在一起时间较多可能会使幼儿更感受到幸福，但育儿参与度低或完全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支持育儿的母亲，可能与幼儿的沟通时间有限，因此其“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这昭示着母亲在有家人的支持下，能够有更多时间参与育儿，这将有利于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形成。

#### 2.2.2.2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及其配偶职业变量的组间比较

图 2-10 和图 2-11 分别显示了幼儿因其母亲及其配偶职业而产生的“主观幸

福感”得分的比较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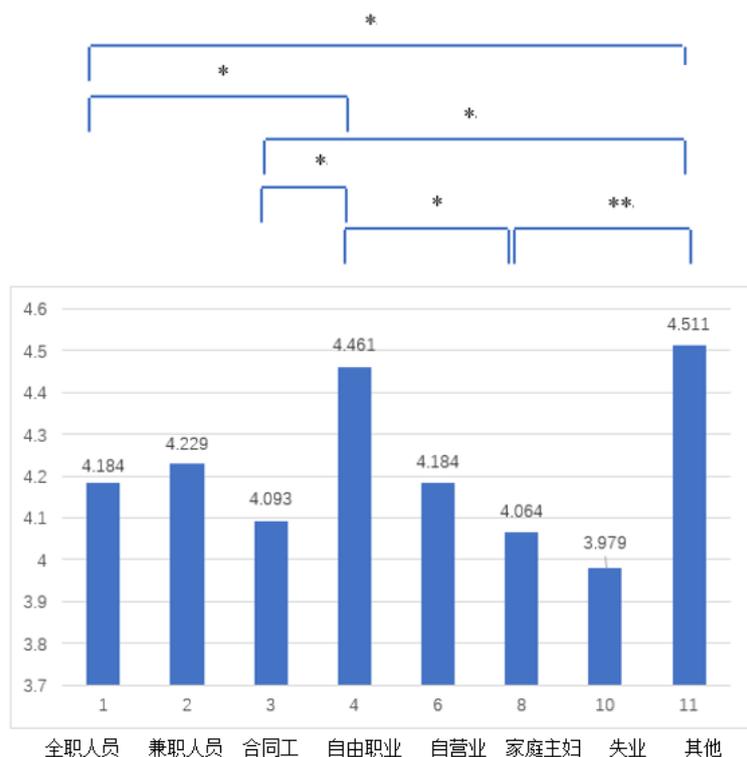


图 2-10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职业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10 中可见，母亲职业为“家里自己做”组以及“其他”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母亲是全职人员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而母亲职业为“合同工”组的幼儿，特别是母亲“失业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得分最低。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存在  $P<.05$  的水平上显著差异。母亲为其他职业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得分在  $P<.01$  的水平上很显著低高于母亲为失业者这组幼儿的得分。说明了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母亲经济状况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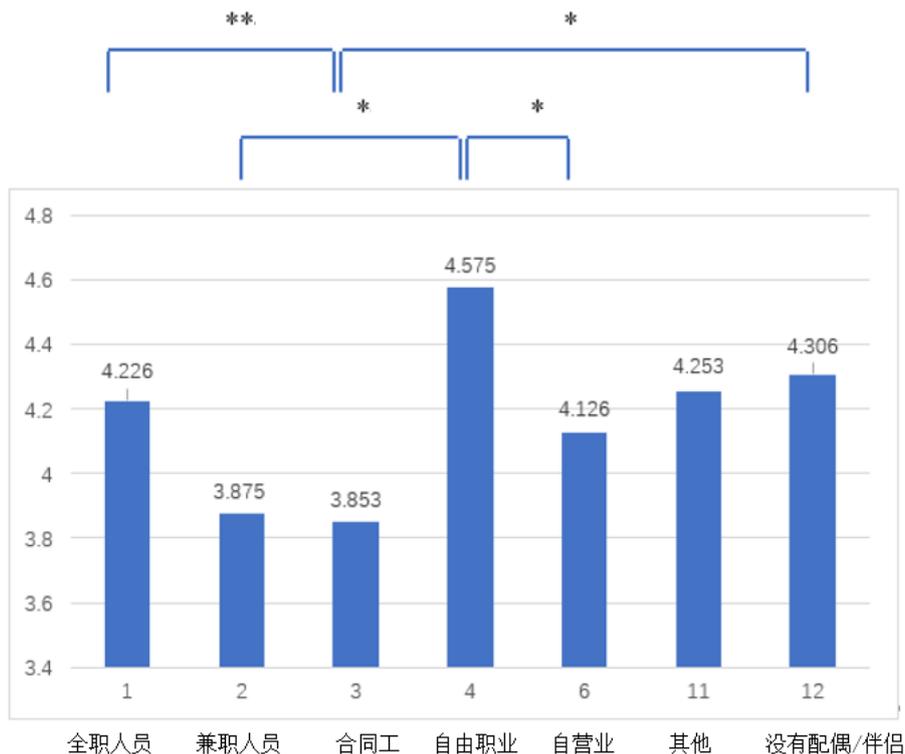


图 2-11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父亲职业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图 2-11 显示，父亲的职业变量在幼儿“主观幸福感”的组间比较差异明显。父亲为自营业者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最强，而父亲职业为“兼职”和“合同工”组的幼儿“主观幸福感”得分最低，在  $P<.01$  的显著水平上低于父亲为公职和自营业者组的幼儿“主观幸福感”得分。由此推测，由于职业的不安定，母亲及其配偶与幼儿的交流质量受影响，因而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

### 2.2.2.3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认可电子产品娱乐性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11 的四个选项，分别表明了母亲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认可度，从第一组到第四组，分别显示了持反对态度及其变化和持肯定态度及其变化。图 2-12 呈现了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在母亲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认可度组间比较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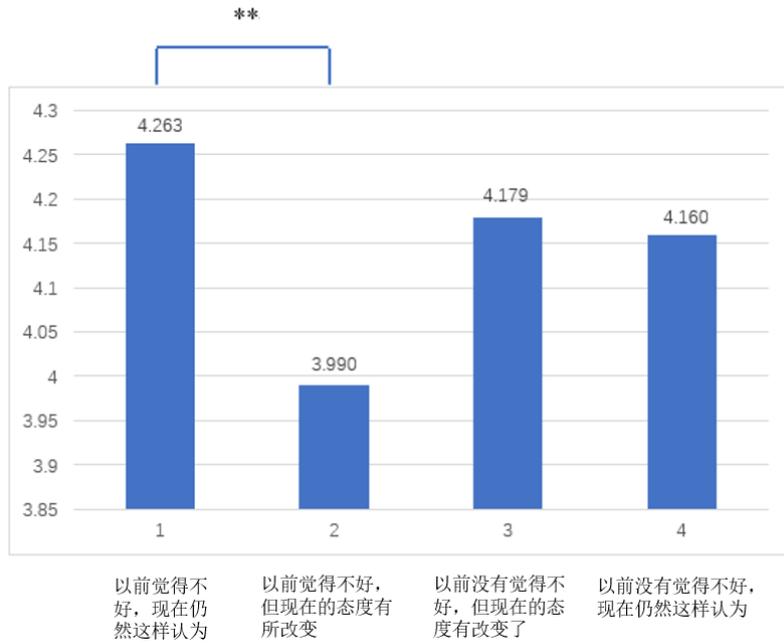


图 2-12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认可电子产品娱乐性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12 可见，母亲持坚决反对并一如既往反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作为娱乐工具态度这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在  $P < .01$  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母亲一开始持反对态度，但因为疫情而改变反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作为娱乐工具态度这组。由图 2-12 推论，在对幼儿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娱乐的问题上，母亲持一贯的反对态度是有利于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形成的。

#### 2.2.2.4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亲子关系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8 聚焦的是问卷填写者，即母亲对亲子关系感知与育儿行为。分值范围从 10 分到 40 分，得分越低，说明其亲子关系越亲密，母亲越能提供积极支持。在数据处理中，将 Q8 中得分为 10-20 分的组作为“积极亲子关系”高分组，而 30-40 分组作为“积极亲子关系”低分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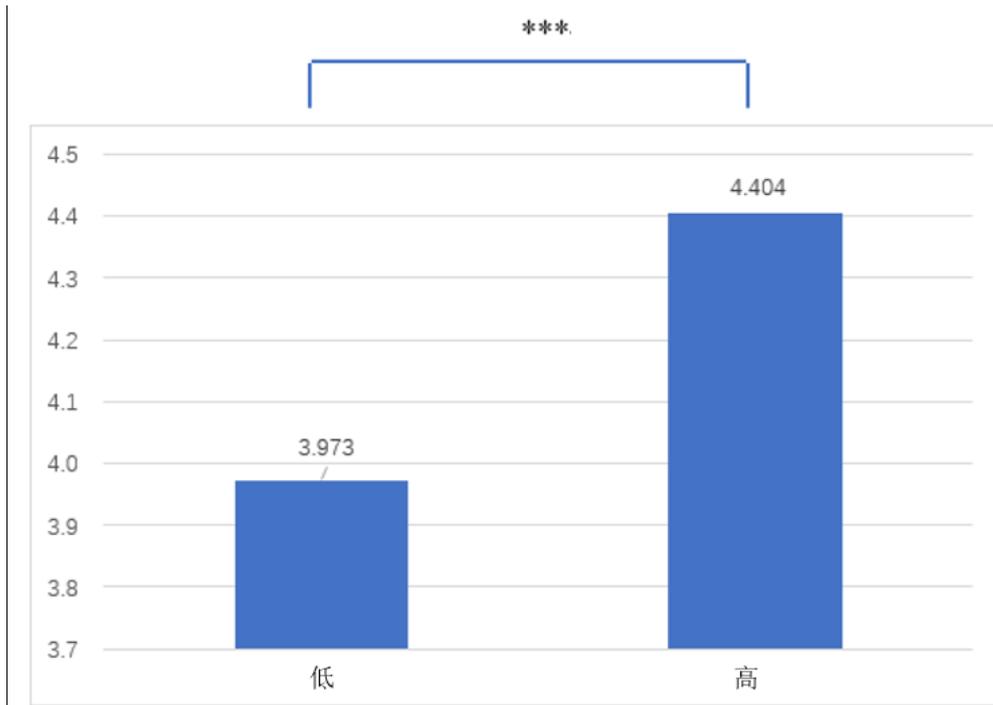


图 2-13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亲子关系”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13 中可见，亲子关系对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很大，母亲所感知和实际育儿行为对幼儿有更多积极支持、恩威并重的这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在  $P<.001$  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地高于母亲所感知和实际育儿行为对幼儿较少积极支持、不讲规矩的这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由此推论：良好的亲子关系，与幼儿的“主观幸福感”之形成有关联。

#### 2.2.2.5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育儿观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17 聚焦的是填写问卷者，即母亲的育儿观。分值范围从 15 分到 60 分，得分越低说明母亲的育儿观越正向积极。在数据处理中，将 Q17 中得分为 15-30 分的组作为“积极育儿观”高分组，而 45-60 分组作为“积极育儿观”低分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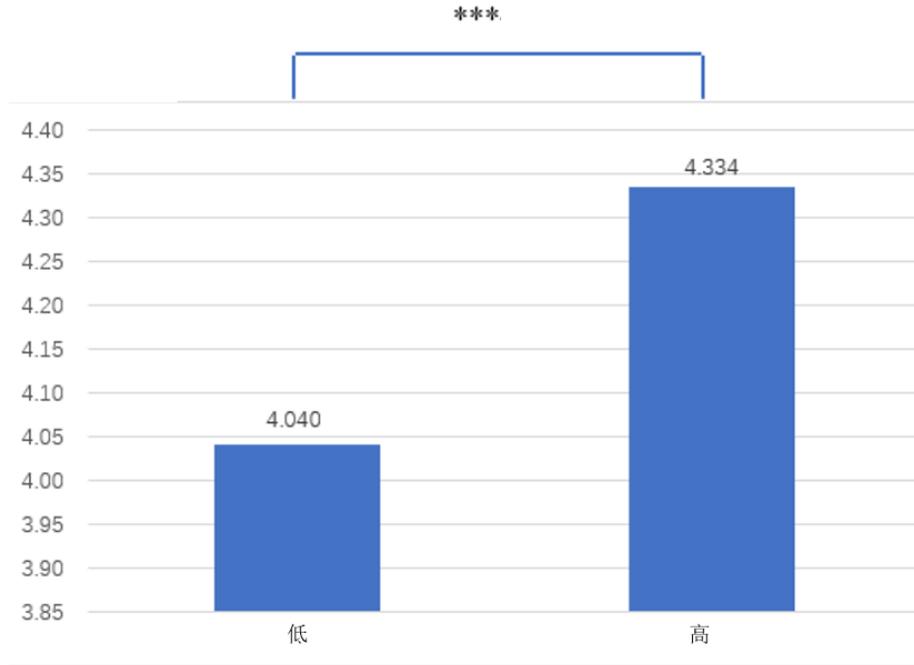


图 2-14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积极育儿观”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从图 2-14 中可见，母亲的育儿观对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很大，母亲持“积极育儿观”高分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在  $P<.001$  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地高于母亲所持育儿观不那么积极这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由此推论：母亲持有的积极育儿观，与幼儿的“主观幸福感”之形成有关联。

#### 2.2.2.6 幼儿“主观幸福感”在母亲满意度变量中的组间比较

Q20 聚焦的是填写问卷者，即母亲的育儿及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分值范围从 5 分到 25 分，得分越低说明母亲的满意度越高。在数据处理中，将 Q20 中得分为 5-10 分的组作为“育儿生活满意度”高分组，而 20-25 分组作为“育儿生活满意度”低分组。以此为变量，对两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了比较。

比较结果显示，母亲的“育儿生活满意度”对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母亲持“育儿生活满意度”高分组的幼儿，其“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在  $P<.01$  的水平上非常显著地高于母亲“育儿生活满意度”较低这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由此推论：母亲满意现有育儿状态及工作和生活状态，与幼儿的“主观幸福感”之形成有关联。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幼儿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较高。

组间检验的结果，说明了以下的变量有较大或者很大的影响。

从人口学变量来看，父母亲的职业对幼儿“主观幸福感”也具影响，父母亲职业稳定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在显著水平上高于父母亲职业为兼职、合同工等不太稳定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从母亲的主观感受和育儿行为来看，亲密的亲子关系、积极的育儿观和自身的育儿满意度以及对电子产品娱乐性使用的控制组的幼儿“主观幸福感”都在极显著水平上高出对比组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 2.3 影响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和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统计手法，对影响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和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 2.3.1 对影响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的因素分析

图 2-15 显示了运用多元回归法对中国大陆幼儿的“心理弹性”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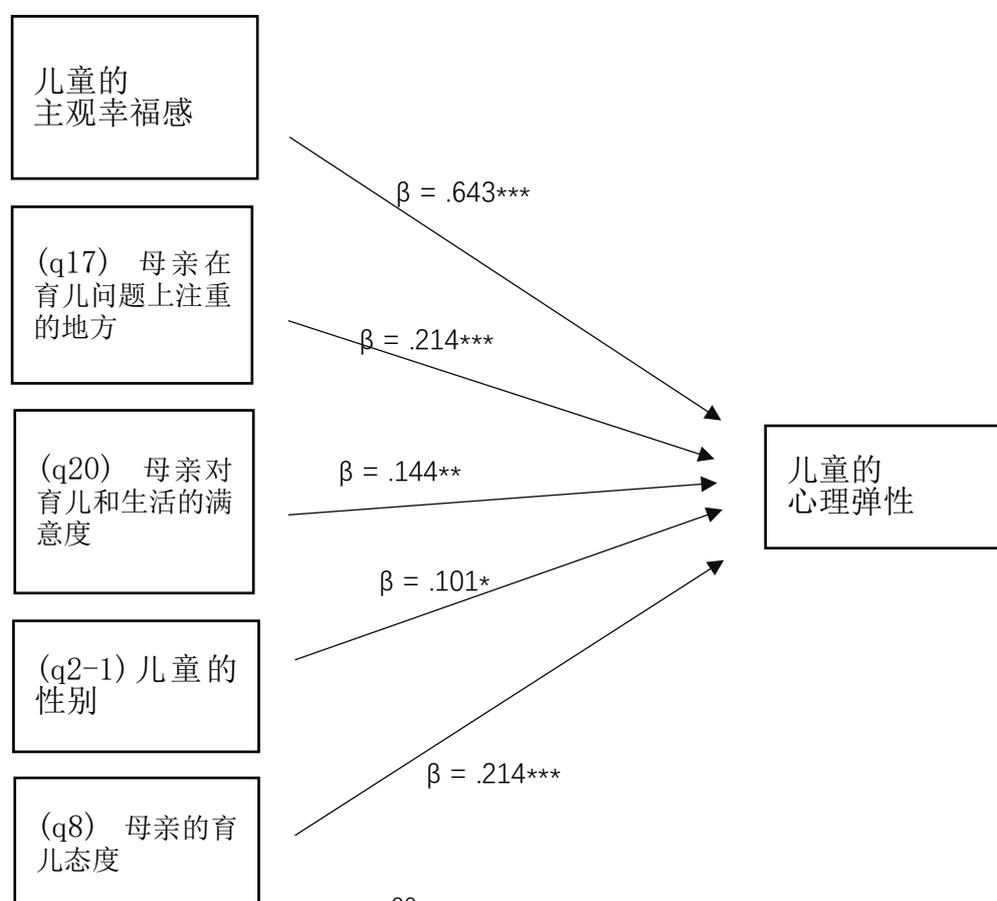


图 2-15 对幼儿“心理弹性”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图 2-15 表明，最具影响力的是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和母亲的育儿态度，这两个变量都在  $P<.001$  水平说明了其强有力的影响。其次是母亲的育儿和生活满意度，也在  $P<.01$  水平说明了其影响力。相比较之下，性别和亲子的实际互动虽也有影响力，但其显著性处于  $P<.05$  水平。

“屏幕暴露”已成为目前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态度和行为对幼儿的“心理弹性”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图 2-16 力图回答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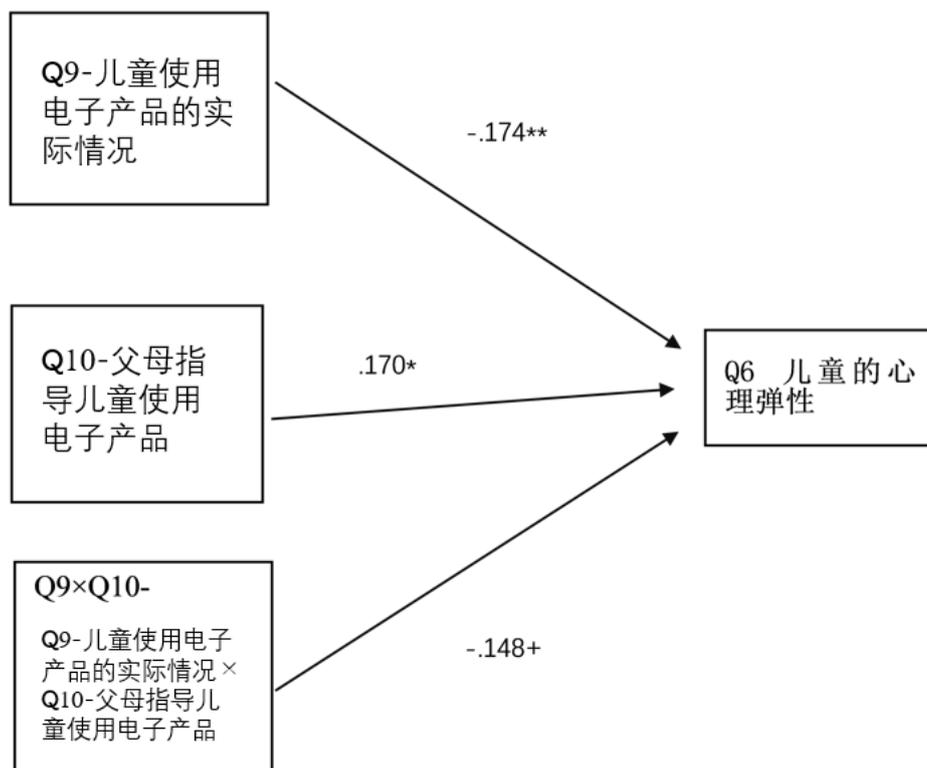


图 2-16 实际使用和指导使用电子产品变量对幼儿“心理弹性”的影响

从图 2-16 显示，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频度越高，其“心理弹性”的水平越低，所以呈现负的相关系数，虽然相关系数只有 0.174，但也在  $P<.01$  水平

有显著性。但非常有趣的是，在父母指导后幼儿使用电子产品，却与幼儿的“心理弹性”成正相关，也在  $P < .01$  水平有显著性。但当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频度和父母指导后幼儿使用电子产品产生交互作用时，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频度仍然具有更大的影响，从而依然是负的相关系数，即虽然父母指导会减低对幼儿“心理弹性”的不良效果，但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频度越高，其“心理弹性”的水平越低的现象无法改变。

### 2.3.2 对影响中国大陆幼儿“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图 2-17 显示了运用多元回归法对中国大陆幼儿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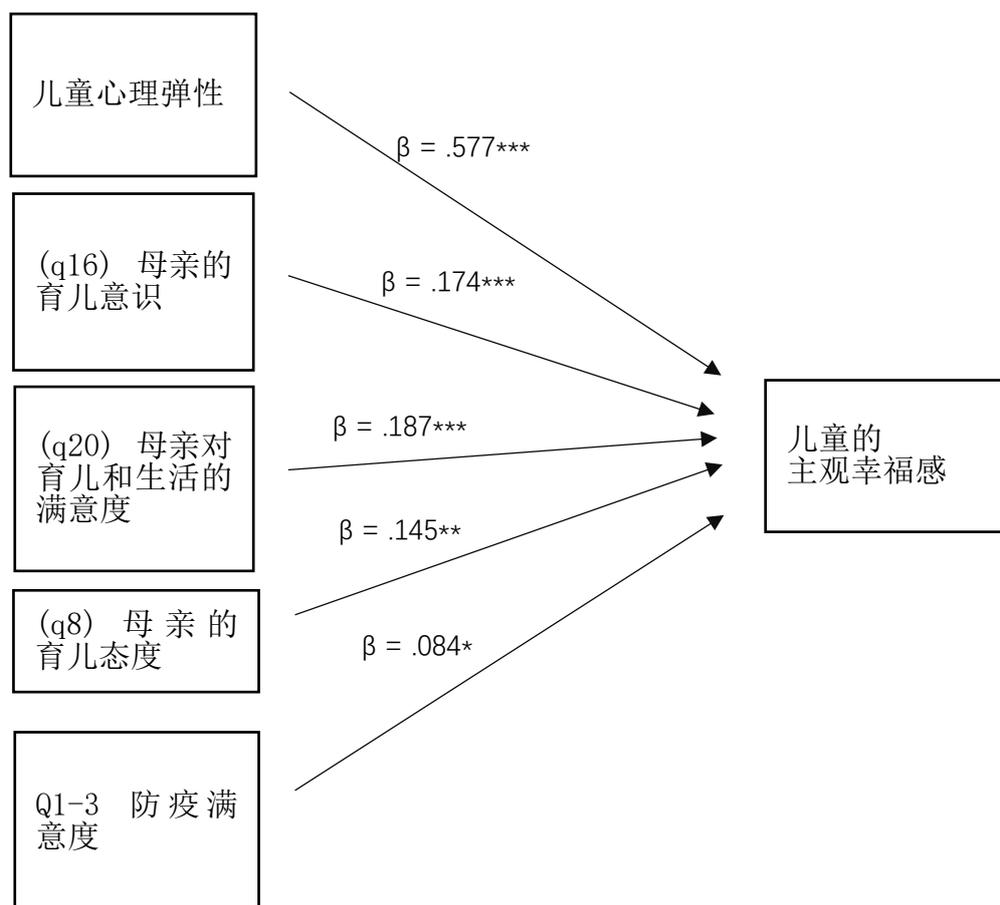


图 2-17 对幼儿“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图 2-17 表明，最具影响力的是“儿童心理弹性”和母亲的幸福感以及育儿

生活满意度，这三个变量都在  $P<.001$  水平说明了其强有力的影响。其次是“母亲的育儿态度”，也在  $P<.01$  水平说明了其影响力。相比较之下，防疫满意度也有影响力，但其显著性处于  $P<.05$  水平。

### 2.3.3 影响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和幼儿“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因素分析

图 2-18 显示了影响中国大陆幼儿“心理弹性”和幼儿“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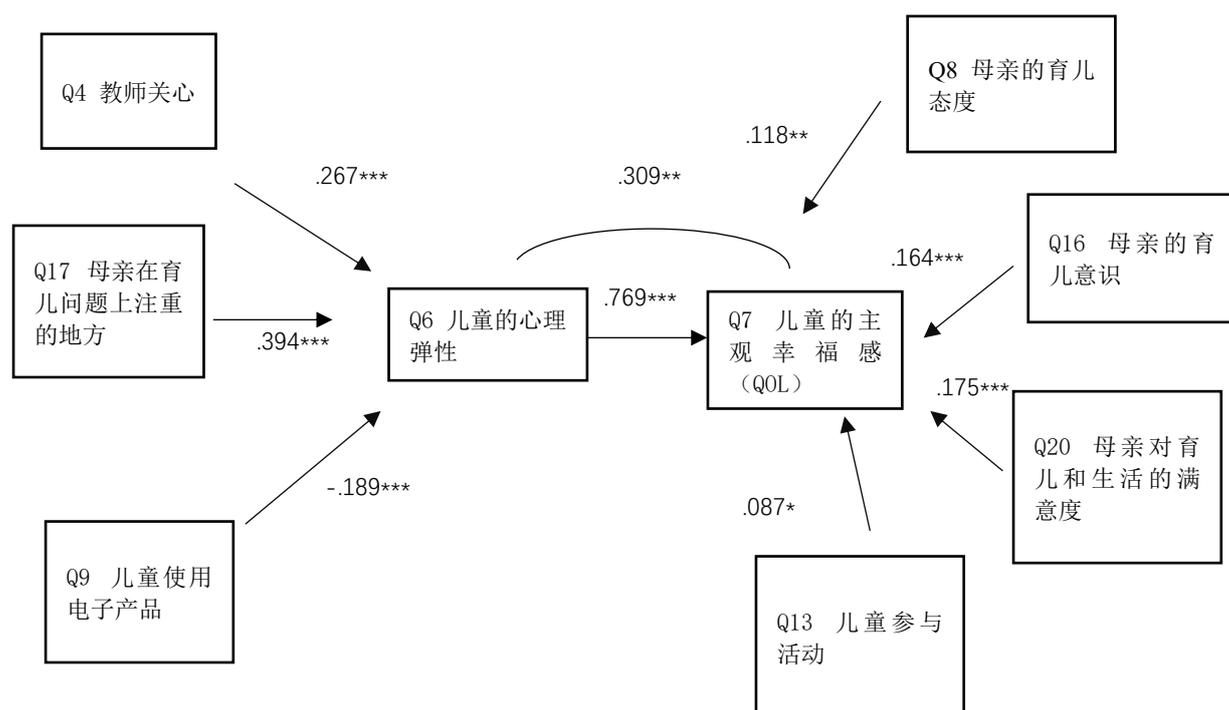


图 2-18 影响幼儿“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图

注：路径图省略大部分相关系数、所有方差。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 $p<.05$ , \*\* $p<.01$ , \*\*\* $p<.001$ .

图 2-18 表明，教师的关心和母亲良好的育儿观，都会正面影响到幼儿“心理弹性”的形成，而使用电子产品则会负面影响幼儿的“心理弹性”形成。这三个变量都在  $P<.001$  的极显著水平上说明了极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对幼儿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就是幼儿的“心理弹性”，其相关系数高达 0.769，处于  $P<.001$  的显著水平。对幼儿的“主观幸福

感”产生极重要正向相关的变量还有母亲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其相关性达到  $P<.001$  显著水平。积极的育儿态度也有助于幼儿“主观幸福感”形成，其显著性也达到了  $P<.01$  水平。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幼儿的“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具有强相关。而母亲的育儿观、幸福感、满意度以及温暖的亲子关系和师幼关系，都会对幼儿的“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使用电子产品则会给幼儿的“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

注：由于相关因子需要调整，Q16 的分析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修订。

特别鸣谢：山西太原市沃德兰教育集团帮助收集数据、朱梦涵和殷宪睿帮助处理数据。

执笔周念丽

2022 年 1 月 10 日于沪